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的 罪感意识与自我救赎^{*}

张 莉 杨小慧

【摘 要】西方文学传统潜存着厚重的罪感意识，体现出罪感文化的精神渗透。在《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中，美国非裔女孩玛格丽特在种族主义与男权主义思想的双重戕害下饱受创伤，背负着沉重的罪感意识。在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身为黑人的玛格丽特接受了种族原罪的灌输；在宗教教义的束缚和父权制社会的压迫下，作为强奸事件受害人的她被迫而又主动地进行了自我赋罪。玛格丽特的罪感意识是在外界环境打压和社会规约潜移默化影响下自我丧失的结果，显露了在现代化进程中自我认同的危机。在民权主义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共同启蒙下，在黑人女性共同体的引领下，玛格丽特终于在对黑人历史与文化传统的找寻中，在自我发现和自我身份确认中，成功挣脱了罪感的束缚，踏上了自我救赎之旅。

【关键词】玛雅·安吉洛 《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 罪感意识 自我救赎

【作者简介】张莉，文学博士，郑州大学外国语与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杨小慧，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2097-1125 (2024) 07-0121-12

一、引言

“罪”是西方文学的经典母题。雨果的《悲惨世界》、哈代的《苔丝》、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罪与罚》、霍桑的《红字》等都细致地呈现了人们在沉

^{*}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纽约知识分子学派’文化共同体思想及其诗学话语研究”(22AWW006)的阶段性成果。

重的罪感意识下的生存状态和复杂的内心世界。读者也常常会在阅读文学作品时深刻体会到罪感意识在西方文化中独特而又普遍的精神渗透。“所谓罪感意识，其实植根于古老的灵肉冲突，植根于人心中的价值理想与肉体感官欲望的冲突……从而造成人的内心冲突和精神痛苦，使人有一种沉重的犯罪感”。^①这种（犯）罪感是罪在人类意识形态中经过反复沉淀、折射后形成的一种情感，是“一个人渴望改正错误时随之而来的一种羞愧感”。^②罪感意识是个体对内心深处生成的罪恶感的强烈感知，以及由此生成的自责、悔悟、愧疚等情感，其背后传达的是一种自我反省与自我审判的意识，体现出人们的价值观与社会环境之间的矛盾冲突。这种自我反省和自我审判的意识虽与西方宗教思想的钳制密切相关，但在20世纪的现代化进程中，在现代性危机逐渐凸显的语境下，更多地同自我认知的问题相关。现代主义一方面擢升自我意志和自我价值，另一方面又让自我承受着社会整体价值观坍塌的风险。人们一方面张扬自我、倡导自由和权利，另一方面又陷入自我反思和自我否定的泥沼中不能自拔，忍受着自我分裂的巨大痛苦，萌发出强烈的罪感意识。因此，罪感意识既是个体的情感体验，也是社会问题的投射。

作家们敏锐地把握到时代的脉搏，即呈现罪感意识折射的社会物质基础与意识形态的变化，由个体之罪的问诊延展至对时代病症的诊断。美国著名黑人女作家玛雅·安吉洛（Maya Angelou, 1928—2014年）的自传体小说《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I Know Why the Caged Bird Sings*, 1969年）便是这样一部力作。作者用细腻的笔触描绘出黑人女孩玛格丽特的创伤经历和成长历程。玛格丽特三岁时父母离异，她与哥哥像包裹一样被寄送至斯坦普斯（Stamps）镇黑人区的祖母家中。在这个南方小镇，她亲眼目睹也亲身承受了蛮横的种族歧视。在八岁时，玛格丽特被接回母亲身边，惨遭母亲的黑人男友弗里曼强奸而产生严重的心理创伤。身为受害者的她一度饱受罪恶感的侵扰，不但对自己心生厌弃，甚至一度失声变成了“哑巴”。小说对黑人女性面临的残酷生存境遇的揭示触目惊心，在民权运动与女性主义运动的双重助力下，产生了巨大轰动效应，不但在商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功，而且获得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国内外学者借助女性主义、后殖民主义等理论视角深入发掘小说对种族与性别压迫的揭露、对黑人自传传统的继承、对青少年成长主题的书写等。在此基础上，本文以主人公的罪感意识为切入点，分析小说在呈现黑人女性个体成长的故事中对社会问题的揭露。安吉洛对玛格丽特的罪感

① 陈刚：《罪感与救赎——基督教的基本精神及其嬗变》，《江海学刊》1995年第6期，第92~93页。

② [英]詹姆士·里德：《基督的人生观》，蒋庆译，三联书店1980年版，第53页。

意识的挖掘，既呈现了黑人女性在身体以及心灵上遭遇的困境，也凸显了现代个体摆脱罪感意识、实现自我救赎的迫切性和可能性。

二、玛格丽特的“病”与“痛”

在成长的过程中，玛格丽特在身体和心灵两个层面都饱受折磨，甚至显现病态的自我惩罚的倾向和症状。在推崇白人至上的美国社会中，身为黑人的玛格丽特接受了种族原罪的灌输；在宗教教义的束缚和父权制社会的压迫下，她又因与母亲男友之间的不伦关系而进行了自我赋罪。作为强奸事件受害者的玛格丽特被迫而又主动地背负起投射至内心的社会之罪。玛格丽特的罪感意识是自我本质在外界环境的打压和社会规约潜移默化的影响下发生危机，导致自我丧失的结果。

（一）种族原罪：种族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化

《圣经》提到亚当和夏娃由于违背上帝禁令偷吃伊甸园的禁果，故而犯下原罪。基督教教义认为原罪是有承续性的，人类是亚当和夏娃的子孙，始祖遗留的罪性会延续到每一个后人身上。在美国种族主义历史上，这种原罪被白人恶意扭曲成一种殖民手段，转嫁至黑人头上。1620年，102名英国清教徒乘坐“五月花”号帆船来到北美大陆，他们渴望在此处建立一个由清教徒主导的殖民地，使用黑人奴隶则是这些自诩为“上帝选民”的白人清教殖民者开发北美新大陆的伴生物。为了名正言顺地统治黑人，这些清教徒声称从《圣经》中找到了黑人理应为奴的理论依据。《创世记》有一段关于“闪之后人将给他兄弟作奴仆的奴仆”的记载，讲的是诺亚之子闪行为不端，诺亚对闪发出其子孙必将世代为奴的诅咒。清教殖民者据此把黑人附会为闪的后代，宣称黑奴为白人役使实乃天经地义。这样的种族主义思维定式影响深远，几乎成为白人的一种集体无意识，也使黑人一出生便无意识地背负原罪。

白人殖民者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圣经》主旨的歪曲和篡改，科学的快速发展让他们找到了“一个建立和证明种族歧视合理性的新框架”。^① 19世纪30—50年代，一批被后世学者称为“美国人类学派”的知识分子，基于颅相学和解剖学等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从体征、生物和智识上将黑人民族“科学地”定义为“低劣”种族。^② 19世纪30年代，美国人类学家塞缪尔·乔

① 《员工之声》编委会：《种族和阶级：马克思主义、种族主义和阶级斗争》，郑祥福、张丹译，《国外理论动态》2019年第6期，第65页。

② 参见张陆昱文、梁茂信：《内战前“美国人类学派”对黑人种族形象的塑造——美国早期种族主义的理论与实践》，《世界民族》2023年第3期，第41~53页。

治·莫顿 (Samuel George Morton) 收集了来自 40 个国家和部落的 147 个成年人颅骨标本, 然后根据各项测量数据出版了《美洲人的颅骨: 北美洲和南美洲各国颅骨比较研究》一书。莫顿在书中提出, 白人因颅脑容量最大而拥有最高的智力和天赋, 黑人颅脑容量最小, 是“低智商”和“愚钝”的代表。^① 古埃及人种学家乔治·格利登 (George Glidden) 宣称, “在各个种族中, 黑人的颅骨在形状上最接近猿的颅骨”,^② 他据此认为黑人是动物并将此结论广泛传播。诸如此类的“伪科学”不仅将黑人形象彻底污名化、罪恶化或非人化, 而且抹煞了黑人传统文明的重要价值。乘此之势, 白人主动参与殖民社会结构的构建, 从普通人的位态转移至殖民空间中的优等人位态, 动辄以国家之力颁布法律, 对黑人进行全方位的统治与压制。1857 年, 著名的斯科特诉桑福德案 (Dred Scott v. Sandford) 最终宣判黑人无论自由与否都不具备公民资格。在南北战争后, 虽然黑人在法律上解除了奴隶身份, 但 1896 年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利用其拥有的国家法律叙事权力宣布“隔离但平等” (separate but equal) 的设施合法, 以“语言游戏”的形式为实行严格的种族隔离政策提供了法律依据。此种情况直到 1958 年仍没有丝毫改观, 根据法律, “在南卡罗来纳、亚拉巴马、佐治亚和南方其他各州, 杀害黑人是不受任何惩罚的”。^③ 在小说中, 玛格丽特自三岁起就生活在一个将种族隔离实施得十分彻底的美国南方小镇——斯坦普斯。在严格的管控之下, 黑人只能苟活于极小的生存空间内, 多数黑人小孩甚至无法得知白人长什么样。当玛格丽特经过白人区时, 她会感到“自己恍若手无寸铁的冒险者独自行走在危机四伏的食人兽领地”,^④ 不由自主地陷入恐慌状态, 感受到自己的社会地位低人一等。

在这一社会建构影响下, 黑人相信自己是负有原罪的劣等人种, 进而产生种族自憎心理——“不仅接受了白人关于客观世界、审美观、行为准则和成就的标准, 而且认为这些标准在道义上讲是绝对正确的”。^⑤ 他们将白人的审美观、价值观作为行为标准, 鄙视自己的身体和肤色, 憎恨自己的丑陋和卑贱, 甚至试图在自己身上塑造白人的特征,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的“漂白”风

① 参见 Samuel G. Morton, *Crania Americana: A Comparative View of the Skulls of Various Nations of North and South American*, London: Simpkin, Marshall & CO., 1839, pp. 5-7。

② 转引自 [美] 罗德·霍顿、赫伯特·艾德华兹:《美国文学思想背景》, 房炜、孟昭庆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1 年版, 第 436 页。

③ [美] 约翰·霍普·富兰克林:《美国黑人史》, 张冰姿、何田、段志诚等译, 商务印书馆 1988 年版, 第 543 页。

④ [美] 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 于霄、王笑红译, 上海三联书店 2013 年版, 第 26 页。

⑤ [美] Frank Chin and Jeffery Paul Chan:《种族主义者的爱》, 李贵苍、徐纪阳译,《华文文学》2005 年第 3 期, 第 31 页。

潮便是最直观的例证。在小说中，玛格丽特从小就因被灌输“白人优越，黑人卑贱”等思想而厌恶自己的黑人特征，认为自己本该是一个拥有“一头金黄长发”和“浅蓝色眼睛”的漂亮白人女孩，是巫婆因嫉妒她的美貌而把她变成了一个“头发又黑又卷”“脚板又宽又大”“门牙间隙大到可以容下一支二号铅笔”的丑陋黑人。^①她不断通过内化的白人视角看待自我，“在潜意识中产生了对种族和个人的自我仇恨、自我抛弃以及罪恶感和羞辱感等心理”，^②甚至一度生出“我们都应该死。我想我会很高兴看到我们全部死掉，一具具尸体堆在一起。……作为一个物种，我们面目可憎”^③的极端想法。在罪恶感的压制之下，玛格丽特陷入自我嫌恶的状态，无法正视自己的文化出身与民族身份。

（二）自我赋罪：宗教教义与罪感文化的道德束缚

玛格丽特在三岁时就被离异的父母送养至祖母家，直至八岁才和哥哥重新回到母亲身边生活。在和母亲一起生活的这段时间里，尚且年幼的玛格丽特被母亲的男友弗里曼残忍强奸。尽管法院判定弗里曼是过错方并判处他一年零一天的监禁刑罚，但玛格丽特认为自己在此事件中犯下了“本罪”（personal sin）。所谓“本罪”，在基督教教义中指人类滥用上帝赋予人的自由意志而背离上帝，即对上帝神圣性的忤逆。玛格丽特认为自己违背了上帝的规约，是一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作为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徒，玛格丽特认为自己违背了摩西十诫中的第七诫——“不可奸淫”，因而背离了上帝和世俗道德。玛格丽特固然是强奸事件的受害者，但是按照基督教教义，无论是自愿还是被迫，她与母亲的男友发生性关系都是犯下了奸淫之罪。另外，玛格丽特误以为自己在这段关系中并非完全被动而无辜。在强奸行为发生之前，弗里曼曾几次把玛格丽特抱入怀中，实施性骚扰。自小就缺失父亲陪伴的玛格丽特以为弗里曼的怀抱便是她一直期待的父爱：“我也希望他永远不要放手。我感到他的怀抱就是我的归宿……他可能是我的生父，而我们最终相遇相拥。”^④在较长一段时间里，她沉迷于弗里曼的拥抱，甚至会主动坐在他腿上寻求情感的力量。玛格丽特接受弗里曼拥抱的行为其实是她渴望父爱的本能冲动，映射出她在生活中极

① 参见〔美〕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于霄、王笑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3页。

② 张立新：《难言之痛——美国文学与文化中的黑人文化身份焦虑与自我憎恨》，《山东外语教学》2008年第3期，第91页。

③ 〔美〕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于霄、王笑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84页。

④ 〔美〕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于霄、王笑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75~76页。

度缺少父母和社会关爱的悲惨处境。然而，玛格丽特竟天真地认为是自己对拥抱的渴望导致了强奸事件的发生。当母亲发现弗里曼的罪行并将他告上法庭时，玛格丽特害怕遭受亲人嫌弃与指责，选择将两人曾多次拥抱的事实向众人隐瞒。但她又在罪感文化的影响下主动接受上帝的拷问，认为撒谎的自己会像撒旦一样被上帝抛弃，失去进入天堂的机会。于是，当来自生命本体的本能冲动与植根于她心目中的价值理想发生冲突时，她的内心产生了一种沉重的罪感，认为自己是主动参与这宗罪的坏女孩。

玛格丽特的自我归罪是西方罪感文化规训的结果。1946年，美国人类学家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在《菊与刀》（*The Chrysanthemum and the Sword*）一书中首次提出“罪感文化”（guilt culture）的概念。本尼迪克特认为西方文化是一种典型的罪感文化，这种文化的核心要义就是“提倡建立道德的绝对标准并且依靠其发展人的良心的社会”。^①在罪感文化社会中，个体会直面上帝的注视，由内化于心的道德约束支配行动。人一旦违背了那个“道德的绝对标准”，即使世上无人知晓其不端行为，也会因背离价值观而感到内心有罪，从而产生一种极度羞耻和罪恶的感觉，即罪感意识。

在基督教教义和罪感文化的影响下，玛格丽特为自己臆造出多重罪人身份，深陷恐惧与自责之中无法自拔。在强奸事件发生后不久，玛格丽特偶然从外婆处得知，尽管弗里曼被法庭判处一年零一天的监禁刑罚，但他在第一天下午就被律师保释出狱，最后被她愤怒的舅舅们发现并被打死在街头。玛格丽特认为弗里曼是因自己撒谎而死的，她“感觉到罪恶在身体里徘徊、等待、积聚，只要一张嘴，它就会喷薄而出”。^②于是，她命令自己停止说话，试图通过“紧咬牙关”的方式将“罪恶封在里面”，^③以防其他人也因她开口说话而死去。在一般情况下，经历过自然灾害和战争、种族大屠杀、性侵犯等暴行的受害者会受到较为严重的心理创伤。当创伤超过受创主体的心理承受极限时，主体会“产生遗忘、恐怖、麻木、抑郁、歇斯底里等非常态情感”，^④并陷入失语、自闭、退缩等极度不安的状态。玛格丽特同大多数受创主体一样，在创伤事件发生后近一年的时间里处于失语状态，不能也不愿开口说话。玛格丽特的失语也是一种主动的自我赋罪和自我惩罚。罪感意识造成玛格丽特情感上的不知所措，由此，情感与语言之间失去了稳定的指涉关系，导致玛格

① [美] 鲁思·本尼迪克特：《菊与刀》，廖源译，中国社会出版社2004年版，第222页。

② [美] 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于霄、王笑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0页。

③ 参见 [美] 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于霄、王笑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0页。

④ 陶家俊：《创伤》，《外国文学》2011年第4期，第117页。

丽特成为情感上的失语者。而且，当情感表达丧失语言媒介时，玛格丽特开始自我封闭与自我贬抑，无力且无心与外界联系。

（三）社会归罪：男性霸权的统治与欺压

在强奸事件发生后，玛格丽特又因“被男性侵犯的女性”这一角色而背负罪感。在《新约·约翰福音》中有这样的情节，文士和法利赛人带来一个行淫时被捉拿的妇人，他们对耶稣说：“夫子，这妇人是正行淫之时被拿的。摩西在律法上吩咐我们，把这样的妇人用石头打死。”^①最终，被捉拿的妇人受到严厉惩罚，而犯了同样罪行的男人则不知是否被惩处。可见在数世纪前，基督教教义似乎已经暗示了“女性更应在不当关系中负罪”。身为虔诚的基督教徒，玛格丽特认为自己同那被众人用石头砸的妇人一样“满身罪恶与肮脏”。^②

玛格丽特的“罪恶与肮脏”是社会归罪导致的被动的自我认知，是社会形塑的结果。这一社会形塑的力量突出地表现在威利叔叔对玛格丽特的态度变化上。在强奸事件发生后，玛格丽特重新回到祖母身边生活，但一向同玛格丽特亲近的威利叔叔开始疏远她，他总是派她去做一些杂事，好让她远离自己的视线。玛格丽特一直将威利叔叔视为身边最亲近的亲人，但威利叔叔的态度无异于在她本就难以愈合的伤口上撒盐。一时间，“所有传到耳朵里的声音都变得沉闷，仿佛人们说话时都蒙着手绢，或用手遮着嘴”。^③玛格丽特觉得所有的人都在议论并嘲笑她，羞耻感和罪恶感逐渐加深，精神每况愈下。

威利叔叔在得知玛格丽特被强奸后表现出的疏远态度反映了一种典型的“受害者谴责”（victim-blaming）心理。“受害者谴责”指在犯罪或者不道德行为中，社会将责任归咎于“不完美”受害者，而不是施暴者或违反道德准则的人。这是很多人在面对性犯罪事件时的惯有思维，也是男性加害者强加于女性受害者身上的一种莫名之“罪”，更是男性中心话语的父权制社会施加给女性身体和灵魂的权力规训。20世纪30年代的美国是一个以男性话语为主导的国家。受制于父权制社会环境，被强奸的女性并不会真正被认作受害者，反而更容易被认定为共同过错者。在很多情况下，加害者甚至将自己的罪恶转移到受害者身上，让被男权禁锢住思维的女性受害者默默承受舆论压力，被罪恶感压得抬不起头。玛格丽特作为黑人女性受害者，承受着更大的压力。种族和性别话题的叠合，使“非裔美国女性的身体成为种族主义

① 《新约·约翰福音》，《圣经》，中国基督教三自爱国运动委员会2009年版，第114页。

② [美] 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于霄、王笑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6页。

③ [美] 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于霄、王笑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96页。

和性别歧视交汇的场域”。^①换言之，虽然非裔男性是种族歧视的牺牲品，但他们同时也可能成为非裔女性的压迫者。弗里曼是一个在白人社会中饱受歧视的非裔男性，他在外工作时只能屈从于白人带有侮辱性的控制而不敢去质疑或反抗。他对玛格丽特的性侵权行为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一种暴力循环，通过这种循环，他将自己在白人社会中承受的屈辱、自卑和绝望释放到了更为弱小的玛格丽特身上。身处于暴力循环之中的玛格丽特无力反抗，她对自己的女性身份产生困惑，在整个青春期都无法正确看待两性关系。而威利叔叔的疏远和蔑视则代表了来自男权社会的无形压迫，这种压迫强化了玛格丽特的罪感意识。

玛格丽特将罪感深植于心。在被种族主义意识形态内化而自觉负有种族原罪时，她按照“社会的绝对规则”规范自己的思想及行为；在被卷入强奸事件后，她按照“道德的绝对标准”对自身进行强烈的谴责和惩罚。然而，所谓的“道德的绝对标准”和“社会的绝对规则”其实是白人殖民者和美国男权社会对黑人女性意识形态的侵扰。在种族和性别话题叠加的美国，黑人女性沦为美国白人与黑人男性共同剥削和压迫的对象，饱受种族主义和性别歧视的迫害，成为美国社会里“他者中的他者”。玛格丽特深陷在“男性的偏见、白人不合逻辑的仇恨，以及黑人无权无势”^②的泥沼之中，主动又被迫地承担起本不该承担的罪。

三、玛格丽特的抗辩与救赎

罪感社会引导人们主动认罪忏悔，对恶果进行弥补，从而使心灵获得解脱。玛格丽特的自我救赎却是在认清自己罪感意识的来源之后，主动对种种无罪之罪进行反抗与摆脱，最终在自我认同与自我实现中走向新生。

（一）消解种族原罪，重建种族身份

20世纪美国黑人运动如火如荼地开展，在这种社会氛围的影响下，玛格丽特对种族问题开始有了更深层次的认知。20世纪前期，“加维运动”（Garvey movement）逐渐兴起。这不仅是一次以“回到非洲去”（back to Africa）为口号的黑人民族主义运动，更是一次文化复兴运动。此运动通过宣传黑人祖先的光荣历史来启发和增强黑人的自尊感和自信心。20世纪20年代，在纽约黑人聚居区发起的“哈莱姆文艺复兴”（Harlem Renaissance）运动，则通过倡导在文学作品中塑造“新黑人”形象，唤醒了黑人群体的民族

^① Bell Hooks, *Yearning: Race, Gender and Cultural Politics*, Boston: South End Press, 1990, p. 57.

^② [美] 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于霄、王笑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77页。

意识。1942年，多种族共同参与的种族平等大会（Congress of Racial Equality）在拒绝为黑人提供服务的饭店里发起静坐运动（sit-ins），并对在美国社会公共区域中存在的其他形式的种族隔离发起抗议。20世纪50年代中期，美国南部黑人开始全面反抗白人的种族歧视，要求彻底废除种族隔离，保障黑人的公民权利。

各种社会运动的洗礼使玛格丽特的心态逐渐产生了变化，在成长中遭遇的各种冲击则直接促成了其民族意识的觉醒。在十多岁时，玛格丽特到白人卡利南太太家里做女佣，从而获得了近距离接触白人的机会。一直以来，小镇上有一层将黑人社会和一切与白人有关的东西隔绝开来的隐形薄幕。在这层薄幕的遮掩下，玛格丽特无法窥探真实的白人世界。她只能通过电影与小说来确定白人光鲜亮丽的“强者”与“享乐者”形象，^①羡慕白人的“完美”生活。后来，卡利南太太的故事解构了玛格丽特对白人的完美幻想——她在年轻时下嫁给了暴发户丈夫，又因无法生育而一直过着孤独的生活，如今变成了一个生活在痛苦之中的又老又丑的妇人。对白人的祛魅引发了玛格丽特对固化的种族观念的重新审视和思考。当卡利南太太随意称呼玛格丽特而不叫其本名的时候，她故意不予理会，甚至有意摔碎卡利南太太最喜爱的瓷器以示抗议。吕新星等指出：“姓名是一个人身份的象征，它不仅与人的出生地和祖先有关，更与一个人的文化和种族身份密切相关。在黑人社会中，姓名对于黑人人格的确定至关重要。”^②玛格丽特对名字的重视是对其中黑人文化内涵的认可，更是对自己黑人身份的认同。在称呼得到纠正的那一刻，她终于不再是主人家的一个可以随意命名的“黑鬼”，而是一个得到应有尊重的大写的人。

身为基督教徒，玛格丽特的种族罪感在其对基督教教义的新认识中得到进一步消解。在一年一度举办的培灵会上，黑人牧师向众教徒悉心讲解“爱”（charity）的含义。他用极富感染力的声音如是布道：“你怎么能声称是我的兄弟，却又憎恨我？那是爱吗？你怎么能声称是我的姐妹，却又鄙视我？那是爱吗？你怎么能声称是我的朋友，却又利用我、伤害我？”^③玛格丽特的心灵在此刻受到强烈震撼，她认识到黑人并非生而卑贱，真正的基督教教义倡导世人本该如同兄弟姐妹般平等友善地相处，一直以来是白人殖民

① 参见[美]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于霄、王笑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26页。

② 吕新星、芮渝萍：《〈巴德，不是巴迪〉：黑人美学与文化身份建构》，《外国语文》2017年第2期，第15页。

③ [美]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于霄、王笑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32页。

者在假借上帝之名肆意奴役黑人。

促使玛格丽特走出所谓的“种族之罪”的顿悟时刻，发生在她十二岁时的毕业典礼上。在此次庄严的仪式上，优秀毕业生代表亨利·里德发表了题为“生存还是毁灭”的演讲。在演讲中，他用生动的语言激励同学们勇敢打破黑人只能“做一个工具、不可笑的笑话、搅屎棍”的刻板印象，向成为一个“行动者、建设者、领导者”的光明未来努力奋斗。^① 他的演讲打动了所有黑人同学和家长，玛格丽特也受其感染，跟着他一起怀着虔诚而又炽热的心唱起了被视为美国“黑人国歌”的《人人引吭高歌》（*Lift Every Voice and Sing*），感受到了黑人文化的独特魅力。这一刻，玛格丽特的民族情怀得以激发，她开始为自己是一名黑人感到光荣，为黑人民族的历史与文化感到自豪。她接纳了自己的种族身份，不再在“种族之罪”里挣扎。

（二）发掘女性力量，唤醒主体意识

父权制是一种要求女性依赖男性、接受男性主宰的意识形态，在很多人包括很多女性看来，这种要求是常识性的、无须争辩的、理应被遵守的。在父权制意识形态的规训之下，女性极度缺乏自我意识和主体意识，只能被动地接受男权社会对她们的随意塑造。小说中的玛格丽特将罪恶背负上身，体现的正是父权制的规训力量。

幸运的是，玛格丽特或者说是玛雅·安吉洛也亲历着20世纪人们在思想上的巨大震荡和变革期。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广泛传播不但促使人们重新审视资本主义危机以及资本主义制度体系，而且直接引发了弱势群体争取同等权利的斗争。发端于19世纪中叶的美国女性主义运动也在这个时期得到了蓬勃发展。世界大战的爆发、现代科技的发展、女性受教育权利的普及等在客观上给了不少女性担当更多社会责任的机会。1920年，美国宪法第19条修正案——《安东尼修正案》（*Anthony Amendment*）获批，美国妇女终获选举权。“20世纪的女性社会责任感、自信心增强，团结协作争取民主和平等权利的意识也得到增强。”^② 20世纪60年代，女性主义运动提出了“个人的就是政治的”（*personal is political*）这一响亮口号。不少女性作家受其启发开始通过书写个人生活经历来揭示美国社会普遍存在的性别歧视的根源。《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就诞生在20世纪60年代的语境下。黑人女孩玛格丽特在对女性力量的发现和确认以及对女性主体性的找寻和建构过程中，完成了自我救赎和自我实现。

玛格丽特最终能走出性别之罪的拘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身边的女

① 参见[美]玛雅·安吉洛：《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于霄、王笑红译，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86页。

② 张莉：《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26页。

性——母亲、祖母和弗劳尔斯夫人等形成的女性共同体的帮助，得益于“姐妹情谊”的力量。“‘姐妹情谊’不仅指女性之间的亲密关系，也包含了她们基于共同的权利诉求和理想愿景而形成的共同体性质的合作关系。”^① 20世纪60年代的女性主义运动明确宣扬“姐妹情谊就是力量”（sisterhood is powerful）。在一系列运动的有力推动下，“姐妹情谊”从家庭走向社会，继而成为具有更为丰富内涵的政治术语和文化符号。小说中的黑人女性在不同程度上遭遇性别、种族、阶级压迫，这让她们能够同仇敌忾，也更具感同身受的同情心。众多女性的遭遇与言传身教发挥了镜像的功能，不但映照出玛格丽特自己的遭遇，激发了她的阶级意识，而且提供了参照和示范，引领她最终摆脱了罪感的侵扰，做出了自主选择。

母亲和祖母是玛格丽特身边的导师。玛格丽特的母亲薇薇安是一位精神独立、思想自由的新女性，她选择在大城市的酒吧里打拼自己的事业并鼓励女儿勇敢选择自己喜欢的工作；她性格刚烈、事业成功，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她都不被男性牵制。这种自由又激进的生活态度对玛格丽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在初中毕业后，玛格丽特和哥哥来到母亲身边读高中。有一天，玛格丽特听到薇薇安的一个男性生意合作伙伴对薇薇安的贬低和辱骂。薇薇安却毫不畏惧，用凌厉的语言反击了回去。最后，她通过自己的努力赢回了合作伙伴的尊重。薇薇安的举动使玛格丽特突然醒悟，女性无须被动接受他人的赋罪。玛格丽特的罪感由自己上次在强奸事件中所受耻辱转化而来，又在此次母亲的受辱经历中成功消解。罪感的消解也激发了玛格丽特内在的自省与自觉。在母亲的引领下，玛格丽特开始尝试摆脱男权社会强加给她的规训与禁锢、重新认识自己的女性身份。

玛格丽特的祖母是受到周围人尊重和爱戴的长者，她在玛格丽特眼中是“力量与权威”的象征。在经济萧条时期，“新政”以种族和性别为根本标准，将少数族裔和女性列为“不值得帮助的”群体。^② 这一政策导致许多黑人无法接受救济，最后只能饿死在街头。祖母在年轻时被男人抛弃，在那段艰难的岁月中独自抚养着两个男孩。但她凭借自身的努力与智慧，在小镇中开着一家杂货店谋生。她用心且灵活地经营着这个小生意，不但让自己的家庭得以体面生存，还热心帮助整个斯坦普斯镇的居民渡过难关，被大家尊称为“亨德森夫人”。玛格丽特从祖母身上明白了女人并不是男人的附属品，她们必须自立自强，凭借自己的力量克服偏见、努力生活并赢得尊重。

在重拾女性身份的过程中，玛格丽特还遇到了她的精神导师弗劳尔斯夫

① 张莉：《美国左翼女性文学研究》，科学出版社2023年版，第75页。

② 参见 Michele E. Gilman, The Return of the Welfare Queen, *Journal of Gender, Social Policy and the Law*, Vol. 22 (2), 2014, p. 258.

人，并在她的引导下认识到了知识的力量。弗劳尔斯夫人是斯坦普斯镇黑人区的一位贵族淑女，她接受过正规教育，举止优雅得体，待人温和有礼，与玛格丽特的祖母情同姐妹。她在听说了玛格丽特的悲惨遭遇之后，便用博学的见识给予玛格丽特心灵上的慰藉，主动引导玛格丽特打开心门。在弗劳尔斯夫人的耐心指引下，玛格丽特通过阅读与倾听治愈了心理创伤。她不仅重新开口说了话，还喜欢上了读书，从书籍中学会了用开阔的眼界、丰富的方法去看待问题、解决疑惑、面对世界。

在周围女性的示范和帮助下，玛格丽特的罪感不仅成功消解，而且转化成内心的一种驱动力量，让她鼓起勇气塑造自我的存在意识，主动去争取自己喜欢的职业并为之付出努力，以黑人女性身份在美国社会中实现自我价值。玛格丽特去电车公司应聘，虽如预想般被白人职员们冷眼相待，但她没有就此放弃，而是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想尽一切办法赢得了面试机会。最终，她突破了种族和性别的界限，成为旧金山历史上第一位有轨电车的黑人售票员。在这个过程中，她逐渐认可了自己黑人女性的身份，并克服了强奸事件后对两性关系的恐惧和回避，选择将身体作为发现自我、确认自我、建构自我的重要载体。正如贝尔·胡克斯所言：“我们要将有关情欲的渴望、认可、欢愉感和满足感放在建构黑人女性主体性的中心，促使黑人女性接纳自己的身体和情欲，从而使自身得到焕然一新的、与之前不同的再现，让自己成为性主体。”^① 玛格丽特成功治愈了强奸事件给她带来的创伤和恐惧，并在怀孕之后体会到作为母亲的喜悦和力量。她终于摆脱了白人道德伦理对黑人的规约、男权社会对女性的规训，消解了身为黑人女性的罪恶感并获得了精神自由。

总而言之，《我知道笼中鸟为何歌唱》记录了玛雅·安吉洛这位传奇女性的成长之旅，由此成为黑人女性传记文学的经典之作。它为身处种族主义与男权主义双重压迫之下的黑人女性发声，示范和彰显了女性走出身心困境的有效途径和巨大力量。玛格丽特的罪感意识既是在社会压迫和规约下丧失了自我主体性的体现，也同在现代化过程中人们普遍感受到的自我认同危机相关。个体只有通过确立和认同自己与民族、种族、性别的历史和文化的关联，才能实现与自我的和解、塑造完整的自我身份。

（责任编辑：陈华积）

① Bell Hooks, *Selling Hot Pussy: Representation of Black Sexuality in the Cultural Marketplace*, in C. Katie, M. Nadia and S. Sarah, eds., *Writing on the Body: Female Embodiment and Feminist Theory*,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7, p. 128.